

先秦诸子“王道”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杨 汉 民

(衡阳师范学院 人文社科系,湖南 衡阳 421002)

[摘 要] 先秦时期的“王道”追求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政治文化现象。不仅儒家极力推崇,其他诸子各家也纷纷打着“王道”的旗号,对于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思想秩序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吕氏春秋》适应战国末期大一统的形势要求,以“王治”为主旨而博采众家之长,虽然其理论没能被秦始皇所采纳,但在秦亡汉兴之初备受重视而一度成为统治思想,如此促使汉代的学者更加主动地从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相关联的角度来思考诸子学派之间的关系。刘安全面仿效《吕氏春秋》而作《淮南子》,董仲舒重新整合各家思想创立了“德主刑辅”的王道教化论。“王道”思想诞生以来,深深影响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直至今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先秦诸子; 王道; 大一统; 《吕氏春秋》; 德主刑辅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4-0018-03

先秦时期的“王道”追求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政治文化现象。除了儒家首倡“王道”大义之外,其他诸子各家也纷纷打着“王道”的旗号。虽然具体理论有所区别,但出发点都在于改变当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动乱局面,以实现天下一统、王权独尊、上下有序的共同目标。所谓“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1]2485},诸子百家争鸣的丰硕成果成为了我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王道”思想诞生以来,不仅对传统封建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今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一 “王道”思想的由来及儒家的推崇

甲骨文中“王”的最初写法很像兵器斧钺之形,先是军事首领的象征和称呼,商周时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说文解字》记载:“王,天下所归往也。……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2]说明“王”能贯通天地人三象,具有崇高的地位和非凡的能力。这自然成为先秦诸子论说的重点,虽然在具体表述上有“王道”、“王者”、“圣王”或“圣人”等不同概念出现,但其实都是按各自标准来构建一个理想的君主形象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

“王道”始见于《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3]认为处事公正无偏,以德行仁者“王”。《史

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1]69}其言描述了帝王之师伊尹设法劝说商汤实行“王道”的故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还记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1]365}说明儒家孔子深谙“王道”,只不过周游列国终未得以任用。孔子的“王道”思想即以仁德为标准,这正如《论语》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4]战国时期“王道”使用得较多了,成为与“霸道”相对的一种治国方式。如孟子以孔子的传人自居,认为人民丰衣足食和养生丧死无憾,乃“王道之始也”^{[5]266},所以提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5]294}。为此孟子还批评“霸道”是“以力假仁”,“非心服也”^{[5]302}。到荀子时尊“王”而不黜“霸”,但终究以“王道”为最高理想。如荀子说:“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6]304}“彼王者则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者道也。”^{[6]158}荀子眼中的“王道”就是要“修仁义,伉隆高,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6]172}。先秦儒家这种以仁政德治为主的“王道”主张,显然是从统治者长远利益考虑的结果。

孔孟荀对于“王道”推崇备至,并将其等同于尧

[收稿日期] 2013-05-03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先秦诸子的‘王道’智慧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资助(编号:11B020)

[作者简介] 杨汉民(1972-),男,湖南祁阳人,衡阳师范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博士后。

舜禹汤文武之道,认为他们是道德意义上绝对正当的政治,而“王道”所遵循的内容就是历代先王传授下来的道德原则和治国方法。如孔子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7]“先王之道”到孟子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5]322}。荀子对于“先王之道”有了更多的认识和表述,如:“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6]83}“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至贵其上者也。”^{[6]116}“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6]121}“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6]295}先秦儒家德化和推崇历代先王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身学说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是试图建立一种独立于现实君主权力并对其具有某种约束力的道德原则。

二 “王道”成为先秦诸子各家共通之话语

先秦儒家最先高举“王道”的大旗,积极探索救治良方,并沿着“内圣外王”的路子构建了一套理想的社会秩序,体现了道德和政治的直接统一。但“王道”作为好的政治或符合道义之政治的代名词,逐渐成为先秦诸子各家共通之话语及其经世的根本道理。不仅关注君主个人的仁德,对于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思想秩序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和方式。

道家老庄的“王道”特点在于“自然无为”,要求统治者清虚自守,听任老百姓自由发展和完善。如老子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8]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9]在老庄看来,君主治理天下应积极效法天道自然,让万物兴起而不据为己有,如此统治才能稳固和得到更多的好处。

墨家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圣王之道,并以三代圣王的言行标准来衡量和处理现实社会各方面的冲突。如《墨子·法仪》说:“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视之。”^{[10]30}《墨子·尚贤上》说:“故古者圣王之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10]66}《墨子·节用中》说:“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制为舟楫,足以将之则上。”^{[10]250}《墨子·鲁问》说:“昔者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10]717}墨子站在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他提出的所有理论几乎

都以圣王为例,希望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和谐局面。

法家的“王道”思想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刑去刑,认为仁义道德是虚伪无用的。如《商君书·开塞》说:“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11]57}《商君书·画策》说:“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11]113}《韩非子·心度》还说:“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12]法家强调人的本性好利恶害,必须通过严刑重赏来达到激励耕战和从令如流的目的。

名家因为名实不符和礼法不分而产生,由此提出:“正名自治之,奇名自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13]425}认为贤明的君主应该做到循名责实和察法立威,如此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和国家长治久安。阴阳家通过探究天地自然规律来确定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现实最合理的社会秩序。如《管子·四时》记载:“是故圣王务时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圣王所以合于天地之行也。……是以圣王治天下,穷则反,终则始。”^{[13]449}他们的实质都是依据各自理论来宣扬其“王道”思想。

《汉书·艺文志》指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14]1746}说明当时“王道”衰微和诸侯争霸,各派士人风起云涌,纷纷为诸侯出谋划策,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之局面。诸子各家从“务为治”的根本立场出发,一方面指出现实“霸道”之不足,另一方面则以“王道”政治为共同理想,并对其内容和实现途径作出各方面的分析。

三 《吕氏春秋》以“王治”为主旨而博采众家之长

到战国末期,秦国统一天下已成大势所趋,诸子百家的交流与融合也越来越明显。如何保持秦国的胜利果实和为即将到来的统一帝国提供一套完备的治国方略,身为秦相的吕不韦招贤纳士并集众编著了《吕氏春秋》一书。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该书“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14]1742},即以“王治”为主旨而博采众家之长。

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实现了国富兵强,并一直沿用征战时候的专法传统。但经荀子考察后认为“霸”而未“王”是“无儒”,所以距王者之功名“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此亦秦之所短也”^{[6]303-304}。除了荀子所说的“无儒”,秦国要实现大一统的“王道”政治当然还要有其他思想内容,不同学派的士人会给

出不同的回答。针对诸子各派的“王道”主张,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从总体上把握了各家思想的政治共同点,同时顺应天下大势把握了由霸而王的历史转折。

《吕氏春秋》明确提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15]于是以秦国统一的发展格局为政治背景,对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筛选,在兼容并包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创新,从而构建了一个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该书论述了尊君与重民相统一的观点方法,评析了德治与法治之间的互辅关系,例举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原则规范,说明了任人唯贤的突出作用,指出了顺逆自然的社会后果,还强调了因时变革的重要性等等。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王治”社会的最高目标以及明确与此相应的种种治理措施,被称为无所不包的“王政全书”。

《吕氏春秋》集诸子各家之大成,客观上适应了战国末期政治和学术思想大一统的要求。但吕不韦编著该书的本意是为了改变秦国只有“霸道”而无“王道”的不足,拟为大秦帝国的长治久安出谋划策。但遗憾的是秦王嬴政亦即后来的秦始皇刚愎自用和独断专行,继续推行法制主义传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脱离了仁义德治的现实需求,以致民怨日深,不久便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走向灭亡。

四 先秦“王道”思想的影响及启示意义

战国秦汉是我国封建社会从分裂步入大一统以及初步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领域由“百家争鸣”逐渐转向以儒学为主体,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奠定了传统封建社会各项制度的基础。

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首先对各家各派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并在“王道”的共同主题下将他们统一起来,不仅上承先秦诸子,同时下启汉代学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该书综合诸子百家的“王治”理论,虽然没能被秦始皇所采纳,但在秦亡汉兴之初备受重视而一度成为统治思想,在以后的封建政治实践中也不断得到宣扬和利用。所以刘元彦指出:“‘霸道杂之’这个原则,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这就说明,《吕氏春秋》所提出的思想,在封建社会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延续着,起到不小的影响。”^[16]

吕不韦的失败和秦朝的早亡,促使汉代的学者更加主动地从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相关联的角度来思考诸子学派之间的关系,同时沿着思想整合的路

径继续深入下去。这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一是刘安全面仿效《吕氏春秋》而作的《淮南子》,其主要特点还在于思想理论的发挥。该书通过传承和总结由先秦诸子而来的“王道”思想,进一步为封建统一帝国探索新的理论体系。因为家族矛盾,加上该书提倡无为而治和反君主专制的观点,自然触犯了当朝统治者的利益,于是遭遇到相似的不幸命运。

二是董仲舒通过重新会通各家各派而加以阐发的官方哲学,则体现了思想理论与现实政治的紧密结合。为适应西汉皇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现实需要,董仲舒在发挥先秦儒家义理的基础上,将阴阳五行学说与道家、法家等思想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较为精致的“德主刑辅”的王道教化论,对巩固当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局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施政纲领和基本原则。

先秦诸子的“王道”思想不断演变和发展,对后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种寄希望于封建君主的“王道”思想未能真正付诸实践,但其毕竟是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反映,部分表达了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向往,更表达了先秦诸子的一种理想和智慧。“王道”思想所体现的关注民生、贵公去私、尚贤使能、德法兼治等若干认识,即使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
- [3] 江 灏.今古文尚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186.
- [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2.
- [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6]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7] 汪受宽.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
- [8]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49.
- [9]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601.
- [10] 吴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11]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2]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76.
- [13] 谢浩范.管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 [14] 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5]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34.
- [16] 刘元彦.《吕氏春秋》泛论[J].中国哲学: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80:86.